

统一战线视域下推进宗教中国化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

燕枳璇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1; 202420020278@hunnu.edu.cn)

摘 要: 进入新时代以来, 推进宗教中国化成为我国宗教事务治理的关键命题, 在统一战线视域下持续贯彻落实宗教中国化更是实现这个命题的重要一环。从它的生成逻辑来看, 宗教中国化理论的形成具有历史性、理论性和实践性, 回答了新时代下在统一战线视域下开展宗教中国化的合理性。从其时代价值来看, 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对内是完善宗教工作、防范化解宗教难题的有效武器, 对外为世界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 展现了中国情。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 在统一战线视域下完善宗教中国化必将凸显其作为思想武装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统一战线; 宗教中国化; 生成逻辑; 时代价值

引言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1], 这是对统战工作在宗教事务上的重要部署,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宗教实际情况的深层理解, 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教政策, 是积极推动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 宗教工作范围广、任务重, 既要全面推进, 也要重点突破”[2], 成为我国宗教事务管理的重要指南, 同时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宗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九大后国家宗教局并入中央统战部, 是新时代下发挥大统战格局, 进一步推进加强宗教中国化的贯彻落实, 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 团结全国各宗教人士凝心聚力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必须在统一战线视域下, 明确宗教中国化方向, 理清其生成逻辑, 了解其时代价值, 是有效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认识论。

1. 统一战线视域下推进宗教中国化的生成逻辑

近年来, 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 实现中国现代化步伐的推进, 统一战线作为我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 它的功能领域日渐突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各族人民、各宗教人士的参与, 宗教在我国历史上与我国社会、政治等都密切相关, 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 如何发挥宗教的作用, 如何引领宗教紧跟时代步伐, 都是值得关注的命题, 于 2015年首次提出的宗教中国化, 不是凭空想象, 而是一个渐进的理论得出过程。

1.1. 统一战线视域下宗教中国化的历史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宗教中国化的政策萌芽与统一战线初步探索。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探索宗教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 初步形成了运用统一战线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框架。1923年李维汉就已经认识到基督教文化侵略的破坏性, 并在革命和统战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宗教统战工作思想, 重点统战工作对象包括宗教界“中上层”和“普通教众”, 已成为我党统一战线宗教工作重要的一部分[3]。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4], 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为宗教中国化奠定了政策基础。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将宗教界爱国人士纳入统一战线范畴, 推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团体成立抗日组织, 如“中国佛教协会抗战后援会”, 实现了宗教力量与民族解放事业的结合。

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宗教的群众性与复杂性, 提出“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这一论述确立了统一战线在处理宗教问题中的方法论原则, 即区分政治立场与信仰差异, 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下团结宗教界人

士，开启了宗教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同时这一理论在革命中得到充分运用，如红军时期与基督教徒傅连璋、藏族宗教人士桑吉悦希的合作，以及抗战时期对回民支队等宗教群体的团结，都体现了这一策略的灵活性与原则性。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宗教制度改革与统一战线制度化建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宗教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推动宗教完成从“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到“爱国爱教团体”的转变，为促进宗教中国化奠定了制度基础。1950年基督教界发表《三自宣言》，天主教界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相继进行制度改革，废除封建特权，建立民主管理体制，逐渐实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适应。

在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在宗教事务治理中的制度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也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全国性宗教团体如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等，将宗教界纳入统一战线组织体系，形成了“党—政府—宗教团体”的治理架构。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宗教具有“五性”特征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既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统一战线引导宗教中国化提供了基本遵循[5]。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宗教工作的法治化和统一战线工作格局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宗教工作策略，将统一战线的法宝功能与法治建设深度融合，推动宗教中国化从政策引导向制度规范、战略深化演进，形成了“依法治理为基、统战引领为魂”的治理格局。2018年新修订的《条例》进一步强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法治要求，实现了“柔性统战”与“刚性法治”的有机衔接。在这一阶段，统一战线通过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引导宗教界将教义教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使宗教中国化从政策要求转化为宗教界的自觉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宗教中国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统一战线工作格局实现系统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一论述将宗教中国化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赋予统一战线新的时代内涵。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凝聚共识、整合资源”的功能：一方面，通过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等机制，将宗教中国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等战略相结合，强化政治引领；另一方面，整合党政部门、学术机构、宗教团体等多元力量，建立宗教界代表人士梯队培养体系，推动宗教界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使宗教中国化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抓手。

1.2. 统一战线视域下宗教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推进宗教中国化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颠倒的世界意识”，指出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在于“现实的苦难”，认为社会主义与宗教在世界观上是对立的，其理论具有长存的科学性，为宗教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俄国实际宗教情况相结合，进一步提出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应采取“既不提倡也不禁止”的原则，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理论参照。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的时代内涵。从毛泽东提出“宗教五性论”，邓小平强调“宗教问题要采取慎重态度”，江泽民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胡锦涛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构成了环环相扣、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在于：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又立足了中国国情把握宗教发展规律；既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又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为统一战线引导宗教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体系建构。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相继出台的19号文件和6号文件对我国宗教理论体系的完善具有里程碑意义，形成了立足于中国本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统一战线推进宗教中国化的理论支撑。2021年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会议上所提出的“九个必须”，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明确了其方向性、原则性。

从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呈现出三维整合的特征：在价值维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宗教中国化方向；在制度维度，以法治体系规范宗教中国化路径；在实践维度，以统一战线机制整合宗教中国化力量。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标志着我们党对宗教中国化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宗教工作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指南[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宗教中国化的文化根基，也是统一战线凝聚共识的文化资源。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历经魏晋南北朝与儒道思想的融合，形成了禅宗、天台宗等中国化宗派，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精神；伊斯兰教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儒诠经”的传统，实现了教义阐释与儒家文化的结合；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本色化的探索，尝试与中国文化对话。这些历史经验表明，宗教中国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宗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互浸润的过程。

统一战线在促进文化融合中发挥着“媒介”作用，通过挖掘宗教教义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通的内容，像佛教的“慈悲”、道教的“和谐”、伊斯兰教的“和平”、基督教的“仁爱”等宗教教义，来推动宗教文化与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相契合。同时，还会借助传统节日、文化交流博览会等载体，促进宗教界与社会各界的文化互动，如在佛教界举办“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伊斯兰教界开展“伊斯兰教中国化理论研讨会”等，实现了宗教文化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合的转变，为宗教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1.3. 统一战线视域下宗教中国化的现实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必然：从“管理”到“治理”的范式转型。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将宗教事务纳入法治化、系统化治理轨道，而统一战线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制度载体与实践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并将其纳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内容，凸显了宗教中国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7]。

从治理的结构来看，统一战线通过“多元共治”破解宗教事务治理的复杂性，我国宗教具有“五性”特征既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如果简单依靠行政手段，则难以应对多元诉求。而统一战线通过协调党政部门、宗教团体、学术机构等多方力量，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治理格局，如浙江通过宗教工作网格化管理，将统战干部、宗教界代表、基层群众纳入治理网络，既保障了信教群众合法权益，又防范了宗教领域风险，体现了治理现代化对协同性的要求 [8]。

从治理效能看，宗教中国化是提升治理精准度的关键步骤，统一战线通过“分类施策”回应不同宗教、不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在西藏，引导藏传佛教寺院参与生态保护，将宗教教义中的“众生平等”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在宁夏，支持伊斯兰教界挖掘和平、宽容等教义，助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这种因地制宜的治理智慧，与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原则遥相呼应，也是求同存异原则在宗教领域的实践，并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

国家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底线防御：抵御渗透与守护文明主体性。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宗教领域已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前沿阵地，因此需要统一战线通过宗教中国化来构建“文化安全防线”。张志刚指出，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方式日趋隐蔽，从“显性传教”转向“文化包装”，试图冲击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此背景下，宗教中国化不仅是宗教自身的适应问题，更是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战略举措。

统一战线通过“五个认同”来强化政治共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9]。这一要求在实践中转化为了具体行动：新疆通过伊斯兰教中国化教育，揭露极端思想与宗教教义的背离；西藏开展“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宣讲，引导藏传佛教界拥护国家统一。统一战线以“政治引领+文化浸润”的双重路径，使宗教界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力量。

从文明维度看，宗教中国化是中华文化包容性与主体性的统一，中华文化历来以“和而不同”包容多元宗教，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对儒道思想的吸收、伊斯兰教与回族文化的融合，均体现了文明互鉴的智慧。统一战线通过推动宗教教义与中华文化对接，如道教阐释“道法自然”与生态文明的契合、基督教界挖掘“仁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鸣，这既守护了文明主体性，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内涵，为文化安全提供了深层支撑。

宗教自身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从“适应”到“融入”的生存逻辑。宗教具有社会性，需要从社会中获得生命力，历史经验表明，宗教只有融入本土文化与社会结构才能持续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禅宗、藏传佛教等本土宗派，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明清时期伊斯兰教“以儒诠经”，实现与儒家文化的对话。这种本土化规律在当代体现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而统一战线正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

统一战线为宗教界提供了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推动宗教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融入”。通过支持宗教团体制定“五年规划”，如《深入推进我国佛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来引导宗教界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战略结合。在实践中，宗教界通过公益慈善、文化传承等方式融入社会：佛教界“慈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超10万人次，基督教界参与乡村振兴项目，都体现出宗教中国化“服务社会”的导向。

从宗教团体建设看，统一战线助力其实现制度中国化。通过推动宗教团体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如佛教寺院的“住持负责制”、道教宫观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等，使宗教内部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衔接。这种“制度适配”既保障了宗教团体的自主性，又使其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为宗教健康发展也提供组织保障 [10]。

综上，统一战线视域下的宗教中国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安全、促进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进程通过统一战线的“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协调关系”功能，将宗教界力量转化为治国理政的积极因素，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多元一体”的治理智慧。

2. 统一战线视域下宗教中国化的时代价值：理论创新与实践贡献

2.1. 统一战线视域下宗教中国化的时代价值——理论创新

拓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新维度。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强调宗教的社会属性与历史性，而统一战线视域下的宗教中国化，通过“政治引领—文化融合—制度适配”的三重逻辑，实现了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发展。首先，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认知上，突破了消极限制的传统思维，提出积极引导的辩证方法论。例如，将宗教界纳入爱国统一战线范畴，通过“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新型关系，破解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二元对立，形成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其次，在宗教功能的辩证认识上，既承认宗教的社会调节作用，又通过统一战线的整合功能抑制其消极影响，如引导宗教界将慈悲济世教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积极推动宗教中国化[11]。

这个新维度来自于对“宗教长期性”的再认识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宗教将长期存在”，统一战线则通过构建多元一体的宗教治理格局，将宗教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既尊重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又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从适应到引导再到共进的动态平衡，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关于“宗教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框架[12]。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体系。统一战线视域下的宗教中国化，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注入了宗教维度的新内涵。第一，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包容性边界。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纳入“四者联盟”，突破了传统统战工作的阶级局限，形成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的治理范式。如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合签署《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共同倡议》，就体现了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原则在宗教领域的深化[13]。

创新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方法。通过“五个认同”教育强化政治共识，同时也尊重了宗教信仰差异，形成政治基础、文化包容、社会参与的三重共识体系。在西藏藏传佛教界开展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既坚守了国家统一的底线，又保留了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为统一战线画出最大同心圆提供了实践样本。

构建宗教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统一战线与宗教中国化的结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宗教治理的创新理论。一方面，提出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型，整合党委、政府、宗教团体、学术机构等多方力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宗教自律、社会协同的治理网络。在浙江开展的宗教工作网格化管理，将统战干部、宗教界代表、网格员纳入治理体系，实现“法治+协商”的双重效能。

另一方面，确立法治与统战协同的治理原则。以《宗教事务条例》为核心，将统一战线的“柔性协商”与法治的“刚性约束”结合，既保障了宗教界合法权益，又明确规范了宗教活动边界。如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的制度设计，既尊重宗教组织的主体性，又通过法律明确其民事责任，体现了通过依法规范和统战协同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创新。

2.2. 统一战线视域下宗教中国化的时代价值——实践贡献

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实践效能。统一战线视域下的宗教中国化，通过强化“五个认同”，来成为抵御分裂势力、巩固国家主权的重要防线。在新疆，伊斯兰教界通过去极端化教育，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揭露极端思想与宗教教义的背离，引导信教群众树立国家高于一切的理念，有效遏制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搞分裂活动的势头。在西藏，藏传佛教寺院开展“国旗、宪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场所活动，将宗教活动与维护国家统一结合，形成从宗教认同到民族认同最后上升到国家认同的递进式共识。

这种实践打破了宗教与民族的捆绑误区，通过统一战线的桥梁作用，使宗教界成为民族团结的积极力量[14]。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界开展参与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促进回汉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印证了宗教中国化在巩固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实践价值。

促进社会和谐与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宗教中国化通过统一战线的社会整合功能，将宗教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积极因素。其一，参与社会服务，填补公共服务空白，全国宗教界创办1500余个公益组织，在扶贫、养老、救灾等领域发挥独特作用：佛教界“慈爱基金”资助10万余名贫困学生，基督教界在乡村振兴中开展技能培训，体现了宗教服务社会的中国化实践[15]。

其二，参与矛盾调解，构建“宗教—社会”缓冲机制。在浙江温州，宗教界人士担任民间调解员，利用教义中的劝善止恶思想化解邻里纠纷，2023年成功调解矛盾纠纷3000余起，成为基层治理的“柔性支点”。

这种实践既发挥了宗教的社会资本优势，又通过统一战线引导其与基层政权协同，形成了多元共治的治理生态。

推动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桥梁纽带。宗教中国化通过统一战线的文化协调功能，实现了宗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可以挖掘出宗教文化中的优秀元素。道教界阐释道法自然与生态文明的契合点，佛教界整理禅修文化与心理健康的关联，推动宗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16]。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将闽南传统建筑艺术与佛教文化进行了较好地结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宗教中国化的典型。

另一方面，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统一战线通过搭建宗教对话平台，如“世界佛教论坛”“中国—伊斯兰国家宗教文化交流周”，既展示宗教中国化的成果，又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这种“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实践，为文明交流提供了中国样本，体现了宗教中国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独特价值[17]。

2.3. 世界意义：为全球宗教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破解宗教冲突困境的中国方案。全球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文明冲突等问题频发，而中国通过统一战线推动宗教中国化的实践，提供了多元共存的治理经验。首先坚持“依法治理与包容对话”并重。既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宗教活动，又通过统一战线吸纳宗教界参与治理，避免“压制宗教导致反弹”或“放任宗教引发混乱”的极端倾向。如对宗教活动场所的法治化管理与“四进”活动相结合，既划清红线，又留足空间。其二，构建宗教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模式。中国将宗教界纳入爱国统一战线，使其成为“建设者”而非“对抗者”，这一经验为多宗教国家处理政教关系提供了参考，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评价：“中国的宗教治理实践，展示了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宗教中国化的实践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

丰富全球治理中的文明对话范式。宗教中国化强调的是“和而不同”文化观，既通过统一战线来推动宗教界去参与文明交往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份力量[18]。一方面，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宗教界与沿线各国家不断开展宗教文化互访，伊斯兰教界与中东国家共同举办了《古兰经》阐释研讨会，推动了“和平、宽容”教义的当代诠释；另一方面，开展了宗教与公益融合的国际合作，佛教界参与了东南亚救灾、基督教界在非洲开展医疗援助，将宗教慈悲精神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体现了文明互鉴的实践智慧，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对话范式[19]。

3. 总结

综上，统一战线视域下的宗教中国化，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彰显了鲜明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从生成逻辑看，其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策萌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制度建构、改革开放后的法治转型及新时代的战略深化，形成了统战引领、制度保障、文化融合的演进脉络；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为根基，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了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现实中国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安全及宗教自身发展需求，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范式升级[20]。

从时代价值看，其既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统一战线理论，又在实践中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文化遗产，更为全球宗教治理提供了多元共治和文明互鉴的中国方案。

新时代推进宗教中国化，需持续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法宝作用，深化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宗教界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蒲长春.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实践指向、理论贡献和世界意义[J]. 世界宗教研究, 2025(2): 1-8.
- [2] 丁时勇, 崔永波.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三重逻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6(3): 48-58.DOI: 10.13946/j.cnki.jcqis.2022.03.005.
- [3] 史苏. 统一战线视域下宗教事务治理研究[D]. 山东大学, 2021.DOI: 10.27272/d.cnki.gshdu.2021.005824.
- [4] 汪倩.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文化引领及其理论建构[J].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1): 44-52.
- [5] 刘克杰. 为首都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J]. 北京观察, 2025(2): 70.
- [6] 在宗教中国化历史实践中谱写新时代新征程道教工作新篇章[J]. 中国宗教, 2025(5): 8-11.
- [7] 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J]. 法音, 2025(3): 7-12.
- [8] 郑筱筠.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构建新时代中国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J]. 世界宗教研究, 2025(3): 1-7.

- [9] 徐以骅. 宗教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和国际面向 [J]. 宗教与美国社会, 2025(1): 3-9, 467.
- [10] 张志刚. 系统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理论与实践十年回顾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3): 95-106.
- [11] 周琳. 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推动全省宗教工作再上新台阶 [N]. 福建日报, 2025-06-06(001). DOI: 10.28232/n.cnki.nfjrb.2025.003711.
- [12] 张祎娜.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 [J]. 世界宗教研究, 2025(5): 1-9.
- [13] 邵萍. 浅析新时代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 [J]. 中国宗教, 2025(5): 26-27.
- [14] 张师平.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创新研究 [D]. 江西师范大学, 2024. DOI: 10.27178/d.cnki.gjxsu.2024.000037.
- [15] 曾铭. 李维汉统一战线思想研究 [D]. 电子科技大学, 2024. DOI: 10.27005/d.cnki.gdzku.2024.005034.
- [16] 梁君思. 中国统一战线话语权建构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统一战线与话语权构建”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4): 51-69.
- [17] 闫月. 统一战线视野下我国宗教中国化问题研究 [J]. 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4): 61-65.
- [18] 中国天主教界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热潮 [J]. 中国天主教, 2022(1): 29-31.
- [19] 王珍.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关于宗教工作内容的解读之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J]. 中国宗教, 2021(4): 40-41.
- [20] 王文东.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理论逻辑及其实践机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有关宗教工作部分的解读 [J]. 甘肃政协, 2021(2): 43-48.